

中东政治与社会

阿拉伯剧变后中东的政治发展：困境与反思^{*}

王 泰

摘 要：阿拉伯剧变后，能够对中东未来政治发展产生根本性、结构性与方向性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五个方面：其一，中东国家在短期内走完民主化进程的道路，既不现实也无可能；其二，当前情况下，中东国家在政治上实现“良治”比追求民主更紧迫；其三，中东国家发展面临的最现实和最紧迫的挑战是经济发展，对这些国家而言，告别贫困比告别威权在当下显得更为重要；其四，虽然现阶段实现宗教改革并不可能，但作为影响地区变革最重要的历史常量和政治文化因素，伊斯兰教发展的方向应该面向未来，从而起到促进历史进步的作用；其五，在中东实现内部和解对政治发展至关重要，而中东国家未来政治发展的出路在于能否坚定地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道路，这也是中东各国在政治层面面临的最大挑战。

关键词：阿拉伯剧变；威权政治；民主化转型；伊斯兰主义

作者简介：王泰，博士，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研究所教授（通辽 028000）。

文章编号：1673-5161(2017)01-0075-15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始于2010年底的阿拉伯剧变是阿拉伯世界内部寻求“自我解放”的一次勇敢尝试，它既不同于受外部直接“强加民主”的伊拉克战争，也不同于2005年穆巴拉克政府“表里不一”的埃及修宪运动，表面上主动推动民主化，实际上是对外部压力的回应。虽然目前对阿拉伯剧变的深远影响作出准确的价值判断为时尚早，但它无疑是一场具有广泛民主内涵的现代政治社会运动。经历了剧变的阿拉伯世界乃至整个中东地区国家，在探索政治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究竟留下了怎样的经验和教训，其

^{*} 本文系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以来埃及宗教与政治关系的历史考察”（13BSS004）、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10&ZD115）的阶段性成果，并受2012年度内蒙古高校“青年科技英才计划（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建设项目的资助。

中又有哪些启示? 本文试从历史视角来回答这一问题, 并就阿拉伯剧变对未来中东政治进程产生的根本性、结构性、方向性意义进行分析。

一、现实之困：“到达丹麦”之路漫长曲折

正如威权统治的转型一样, 比较政治学研究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弗朗西斯·福山认为, 政治学家不可能像经济学家那样找到所谓的“精简理论”, 因为政治的关涉因素庞杂, 具有偶然性、本土性和回溯性的特点。^① 二战以来, 西方学者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发展的研究建立起一整套完备的学术话语体系, 即使对于像拉美、东亚, 或者东欧、非洲地区, 其比较政治研究的理论视角、框架、方法和成果也已相当成熟。唯有对中东地区的比较政治研究缺乏一个完整的体系。正如所谓的“中东例外论”那样, 中东研究从体系上似乎是一个同样“被例外”的领域。

阿拉伯剧变以来, 中东转型进程所展现出的残酷现实, 让世界目睹了该地区对通过变革实现从威权政治转型到民主政治建构、最终“到达丹麦”的期待, 但这无疑是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福山提出的“到达丹麦”, 其实是一种政治建构的“想象”或“隐喻”, 即建立现代政治制度。^② 因此, 如伊拉克、阿富汗等所谓“异常混乱和贫穷的国家”最终都能转变成为“丹麦”, 对于比较政治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都极具吸引力和挑战性。

无论是从国际历史经验比较的理论视角, 还是从中东政治演进的现实视角, 尤其是从阿拉伯剧变爆发以来中东秩序的“崩溃”来看, 中东国家在短期内建立现代政治制度的可能性较低。

现代民主制度在西方的建立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其间充满了制度形成与变迁的偶合性、复杂性、艰难性与渐进性, 在其他地区建立现代民主制度更不可能一蹴而就。萨缪尔·芬纳 (Samuel E. Finer) 在《统治史》中指出, “现代国家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到来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技术问题、经济问题或生活质量指标、政治发展和思想进步等问题, 它们跌跌撞撞地到来是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经济和军事等因素相互冲突的结果”^③。因此, 民主制度的演化过程显然不是如某些西方学者所言的“自发理论”, 而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逐渐建构起来的。

^① [美]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8 页。

^② “丹麦”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具有良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国家,它民主、稳定、热爱和平、繁荣、包容、政治腐败极低。参见 [美]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到法国大革命》,第 19 页。

^③ [英] 萨缪尔·芬纳:《统治史:从苏美尔到罗马》,王震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中译序第 6 页。

福山在另一项研究中指出,国家、法治、问责制政府是有效政治秩序的基石,它们出现及组合的方式导致政治形态的结果各异。实际上,以上三种因素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能取得这种平衡,本身就是现代政治的奇迹。^① 将现代制度移植入其他社会,在没有考虑现有规则和意愿的情况下是事倍功半的。建立制度不像建造水电大坝或公路网络,其间必然有许多困难亟需克服。当务之急首先应是达成必须要变革制度的共识,其次与支持变革的人们一道战胜旧制度中既得利益群体的抵抗,最后建立并遵守一个值得大家信服的新行为准则。^② 从政治演进的现实视角来看,经历了剧变的各阿拉伯国家为何会在通向现代民主制度的道路上遭遇如此多的坎坷?“9·11”事件以来,中东地缘政治经历了深刻变化,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不论是美国试图从外部强行“民主改造”中东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还是从地区内部主动寻求民主的阿拉伯剧变,似乎都以失败而告终。“9·11”事件以来,美国高举反恐大旗,强行推出了“大中东民主计划”,许多地区国家在强制性改造中不得不接受民主的“夹生饭”,为阿拉伯剧变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反观几年来阿拉伯剧变的发展,其摧毁性显然多于创建性。埃及威权政府回潮倒水;利比亚、叙利亚、也门内战久拖不决,引发了一波又一波人道主义危机;突尼斯政治重建进程较为顺利,于2014年底选出新一任总统埃塞卜西,但经济复苏势头仍不明朗。美国学者伊萨克·迪旺(Ishac Diwan)对此感叹:“如今,自‘阿拉伯之春’的废墟中崛起的新政权,从已完成的交易中继承了一套残破的制度。拜‘小官贪腐’和极端化的政治环境所赐,落实公平而执行有力的规则,当前亦不可期。”^③而西方所谓“阿拉伯之春”的术语对应的是东欧国家的民主化转型过程,从先验的角度来看,这一表述过度简化了中东政治因素的复杂性,事实也确实如此。

其次,中东传统政治秩序近年来趋于崩溃,特别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崛起给地区和世界安全,乃至人类文明进程都带来了严酷的挑战。“伊斯兰国”组织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该组织早年活跃于约旦,“9·11”事件后转战阿富汗,2003年后在伊拉克北部发展壮大,直至在叙利亚内战中迅速崛起,2014年宣布“建国”。^④“伊斯兰国”组织拥有管控严格的官僚机构、统筹完善的基层组织、有效的经济财务管理,同时还具有运用新媒体进行自我宣传的能力。^⑤从秩序构建和治理的角度来看,尽管该组织缺乏政治合法性与正义性,但在战火纷飞的伊拉克及叙利亚部分地区,

① [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到法国大革命》,第21页。

② 同上,第433页。

③ [美]伊萨克·迪旺:《五年后,“阿拉伯之春”留下了什么》,载《青年参考》2016年3月16日,第2版。

④ [英]查尔斯·利斯特:《“伊斯兰国”简论》,姜奕晖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43页。

⑤ 同上,第47页。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它却部分承担了衰败政府的治理责任,如对面包等必需品提供价格补贴、修复基础设施、提供医疗保健等服务。^①正如英国学者查尔斯·利斯特所言,死刑(有时是钉死在十字架上或者被投石处死)和截肢(谋杀、通奸、抢劫等罪行的刑罚)无疑表明了“伊斯兰国”组织令人震惊的残暴程度。此种“大棒”,再加上社会服务所提供的“胡萝卜”,有时会令“伊斯兰国”组织至少在近期内成为可行的替代选择:一方面替代压制、注重宗派、深受境外影响的政府,另一方面替代无能的“温和”反对派。^②

然而,尽管“伊斯兰国”组织绝不是一个合理合法的主权行为体,但却具有极大的冲击性。该组织的崛起实质性地摧毁了中东腹地的边界划分,强烈冲击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框架下的中东主权国家秩序。美国著名学者基辛格对此忧心忡忡,他认为叙利亚、伊拉克以及周边地区的冲突是一个不祥之兆:国家分裂为不同部落和教派单元,其中有的分布在现存边界两边,彼此或你死我活地拼杀,或受到相互竞争的外部派别的操纵,除了实力至上法则(霍布斯也许会称之为自然状态),不遵守任何共同规则。^③秩序重建的前提是民族国家的重建,因此,一个完全缺乏秩序、混乱且动荡的中东很难实现真正的民主。

二、政治之道:实现“良治”比追求民主更紧迫

对中东而言,既然“到达丹麦”是一个漫长且痛苦的过程,那么经历剧变后的中东所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又是什么?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伴随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到来,大量威权主义国家以不同方式建立了民主政体,并实现转型。在大约30年的时间内,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国家从此前的30个发展至近120个。^④美国学者拉里·戴蒙德认为,自民主国家出现以来,上述30年是民主制度扩散最广泛的一段时期。^⑤此等“民主盛世”不禁使许多学者认为,民主政体的建立将为这些国家提供强劲的发展动力,经济繁荣的成果也将惠及民众,并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民主、和平及繁荣的世界。

然而,上述观点忽略了部分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出现的分裂、内战、经济休克、

① [英]查尔斯·利斯特:《“伊斯兰国”简论》,第85-86页。

② 同上,第87页。

③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179页。

④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

⑤ [美]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榕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页。

腐败盛行、国有资产流失,以及非民主政体回潮倒水的情况。“民主政体”究竟能否提高政府质量,进而使国民享受到发展成果等问题成为困扰政治学研究的难题。“在传统的观点来看,由于民主能够内在地满足政治平等和自由的要求,以选举为代表的参与和竞争的扩大,会为民主政体带来政治正当性的基础。民主政体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正在于它能够通过选举而在政治的‘入口’或‘起点’上为特定的政府提供政治正当性。”^①但研究表明,政治正当性的基础并非只是由选举程序产生的代表性决定,实际上政府质量所产生的政治绩效仍发挥了主导作用,无论对于新兴民主国家,还是老牌民主国家,情况都是如此。

这意味着,良好的政府质量或者说实现“良治”远比追求民主更加重要。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优先性”问题,或者说建立“强国家”、“强政府”绝对不是什么“老革命”遇到的“新问题”。早在半个世纪前,亨廷顿就在《政治发展与政治衰败》、《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等著述中就强调指出,“要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与衰败,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政府,并依靠强大政党的缔造与巩固来维持稳定”^②。正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形成的过程中,由第一代中东民族主义者建立起来的威权政治秩序具有其内在的合法性基础,代表了一段时期内中东政治发展的方向,为民族解放、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是必须予以肯定的。然而,时过境迁,在种种内外因素的作用下,这些政权最终在剧变中被推翻,成为一个以“弱国家、破碎的经济和脆弱的政权”为特征的“伤痕累累的新世界”。^③

因此,当福山提出强国家、法治和问责制政府三位一体的政治秩序时,充其量只能说是“年轻人”遇到了“老问题”。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朗西曼指出,在强政府、法治、民主问责三者的平衡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强政府的作用,一个缺乏治理能力的政府无一例外地会在民主化进程中道路坎坷,甚至民主会加剧国内的动荡因素,从而侵蚀政府施展权威的能力。^④

事实上,美国试图在伊拉克、阿富汗建立的“民主橱窗”并没有如其所愿。在政权支离破碎后丧失治理能力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政府虽然是“民主”的,但绝不是有效的。伊拉克为照顾各方势力而不得不面临政府机构臃肿、国家行政开支沉重的现

① [美]拉里·戴蒙德:《民主政治的三个悖论》,载刘军宁主编:《民主与民主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1-141页。

② 岳世平:《亨廷顿的政治制度化思想及其当代启示》,载《理论探索》2006年第5期,第140页。

③ Valerie Bunc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socialism”, *Slavic Review*, Vol. 58, No. 4, 1999, p. 58.

④ [美]戴维·朗西曼:《福山的良治社会三要素》,许雯佳译,FT中文网,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8576>, 登录时间:2016年6月25日。

实。据统计,自 2003 年以来,伊拉克政府因腐败就损失了 3,000 至 5,000 亿美元,^①政府和军队中充斥着领取空饷的人。^②对受到剧变冲击的政权而言,本就良莠不齐的国家治理效能普遍被民主制度所稀释,更加凸显了乱局下对“良治”的迫切需求。

2011 年“一·二五”革命以来,埃及同样面临民主化操之过急的问题,穆尔西政权遭埃及军方罢黜,恰恰表明了埃及人民“要民主,更要良治”的决心。穆巴拉克政权被推翻后,作为埃及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成果,穆尔西成为埃及历史上首位民选总统,但穆尔西同时也被评价为一位糟糕的领导人。穆尔西及其穆兄会支持者更关注巩固政权,而不是兑现其承诺。如果抱着民主主义的陈词滥调,那么埃及人民理应继续通过民选的方式使之下台,但缺乏耐心的埃及人民最终寻求军队通过政变方式推翻民选总统穆尔西,这正是由于穆尔西没有带来民众期望的“良治”与绩效。因此,就国家而言,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使命任务,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也是个奢侈品,只关注民主化而忽视国家的构建,民主转型便只能成为奢望。^③加强中东地区“强政府”的构建,既需要地区层面内作为“硬件”的民族国家重建,也需要作为“软件”的政治制度化的提高。

从民族国家构建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来看,中东地区本身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处于较低水平,国家构建仍处于起步阶段。对于单一民族国家而言,民族认同向国家认同的转变基本上也是步履蹒跚。阿拉伯剧变带给地区国家的教训是,追求所谓“一人一票”的民主,只会更加突出部落、民族、宗教等利益团体的归属感,这是造成利比亚、也门、伊拉克战局,以及埃及、突尼斯(这两个国家已经基本稳定)等国内部政治纷争频仍的重要原因。

从治理能力的角度看,“强政府”也需要突出“良治”,这既是阿拉伯剧变爆发的深层原因,也是中东国家未来政治发展的方向。总体而言,中东国家政治体系构建需要重点解决以下两个问题:在宏观政治要素构成中,政治继承、政治参与、政治文化以及政治责任是中东国家加强“良治”过程中需要突出的四大政治要素;从国家治理角度讲,政府体制建设以及经济治理问题是中东国家维护政治、社会及经济稳定的两大支柱。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是实现“良治”的制度基础。对于阿富汗、利比亚、伊拉克等国而言,他们迫切需要现代民族国家重建。埃及、叙利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国家,从表层意义上虽已经建立起了民族国家,但本质上仍需要实现现代化的深入发展,至少需要具有比较充足的官僚阶层储备,法治逐渐超越人治,政

① Loveday Morris, “A Perilous Pledge to Tackle Graft in Iraq,”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23, 2015.

② Baghdad, “Iraq’s Troubled Politics: Uneasy Lies the Head,” *The Economist*, October 31, 2015.

③ 田小红:《一个管事的“强政府”比民主更重要——读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载《国外社会科学》2015 年第 1 期,第 143 页。

府对社会的供给性服务也需要得到提升。更为关键的是,对中东国家而言,无论是共和制国家,还是君主制国家,从多个层次和维度重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同时,更需要有效统筹各阶层和社会资源,告别“不同政治派别的‘意识形态秩序’、地方政府的‘家族秩序’、各种利益集团的‘狭隘利益秩序’等”,^①其要旨是使中东国家整体上拥有一种统一、稳定的秩序结构,使社会经济政治等得到正常发展。^②此外,在从乱局向稳定的过渡转型过程中,国家治理不是一种可供简单模仿的全球统一模式,而是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变革。中东国家根深蒂固的伊斯兰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类型各异、层次不一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地区国家绝对不能遵循单一的、他者的发展模式,关键是抓住“强政府”的“良治”思维,走上复合式的、适用于本土的发展道路,突出治理绩效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三、经济之基：告别贫困比告别威权更重要

任何关于政府良治和民主的讨论都无法回避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命题：“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③那些叫嚣即便是“坏的民主也比好的独裁要强”的言论,实际上忽视了人的基本需求,更像是一种缺乏理性的强词夺理的文字游戏。“人们追求民主,完全不是为了更加糟糕的生活,更加混乱的社会,这种噩梦般的社会完全违背了梦想的逻辑,本身就抹黑了人们的美好向往,用理性缺陷代替了明确的目标方向。”^④

近代以降,中东面临西方殖民者侵略的巨大压力,民族独立成为时代的主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发展无法提上历史日程。从东方国家遭遇的普遍历史经验来看,不实现民族独立,便谈不上发展。但在民族独立的任务完成后,经济社会发展的进步就应成为最主要的民族任务。然而,中东国家在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后,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无暇顾及发展问题,或在发展方向上出现偏差。直至今日,除以石油美元支撑经济的海湾国家外,其他国家的经济大多乏善可陈,最终演变成一幕幕民生之困的悲剧,进而引发了剧烈的政治动荡,其经验和教训是值得深刻记取的。^⑤

^① 景维民、张慧君:《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进程、问题与前景》,载《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第76页。

^② 同上。

^③ [德]恩格斯:《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3月18日前后)》,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2页。

^④ 陈功:《民主不可能通过转型实现》,FT中文网,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5230>, 登录时间:2016年6月29日。

^⑤ 李意:《中东国家政治转型期的不稳定因素分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7期,第55-56页。

首先,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进程长期受外国干预,经济结构单一,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在全球化分工中处于边缘位置。外部干预尤其加剧了中东国家的贫困与落后,扩大了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差异,使其经济结构长期处于畸形状态。其次,战争、动荡和国际制裁长期伴随并制约中东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与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相比,中东国家社会财富的积累经常受到动乱、内战和国际制裁的制约或被打断,其严重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再次,许多中东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的经济发展严重依赖油气资源出口,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和经济畸形发展,使其面临社会改革的沉重压力。最后,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许多中东国家的民众并未充分享受到现代化成果,政府的经济政策未能改变民众生活水平止步不前或倒退的现实,导致城市建设滞后、失业率上升、社会失序、文化冲击等一系列问题。当民众期望通过改变政治制度来摆脱上述困境时,通常会诉诸暴力,从而引发大规模社会冲突。

阿拉伯剧变以来的政治实践表明,这些国家不仅没有实现繁荣与稳定,反而出现了更加严重的政治衰朽和经济恶化。经历剧变的几个主要阿拉伯共和国 2010 年到 2015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如下表所示),充分说明了剧变给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冲击与影响。此外,阿拉伯民众对国家发展方向的不满情绪也不断上升,民意调查显示,突尼斯和埃及民众的不满意率高达 78% 和 62%;同时,认为国家经济状况较此前更为糟糕的民众更多,在突尼斯和埃及分别达到 83% 和 76%。^① 有阿拉伯学者感叹,当前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是“有毒的民主”,它将使更多的阿拉伯国家继索马里、伊拉克和苏丹之后沦为“失败国家”。^②

2010~2015 年五个阿拉伯共和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年份	埃及	突尼斯	利比亚	也门	阿尔及利亚
2010	5.1%	3.2%	5.0%	3.3%	3.6%
2011	1.8%	-0.5%	-62.1%	-15.1%	2.8%
2012	2.2%	4.7%	104.5%	2.5%	3.6%
2013	2.1%	2.5%	-13.6%	4.2%	2.8%
2014	2.2%	2.7%	-24%	/	3.8%
2015	4.2%	0.5%	-5.2%	/	2.8%

资料来源:“GDP Growth (annual %),” The 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 登录时间:2016 年 5 月 26 日。

^① Hafez Ghanem, “Will Tunisia Follow Egyp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July 25, 2013, <https://www.brookings.edu/opinions/will-tunisia-follow-egypt/>, 登录时间:2016 年 11 月 10 日。

^② 薛国庆:《转型阿拉伯国家的社会文化思潮》,载刘中民、朱威烈主编:《中东地区发展报告:转型与动荡的二元变奏(2013 年卷)》,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6 页。

那么,究竟怎样的政府才能给中东带来幸福?重建的政治体制是否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提出经济要求,不直接而迅速地改善劳动群众的状况,劳动群众是永远也不会同意去考虑什么全国的共同‘进步’的。只有在改善劳动者的经济状况的条件下,群众才会投入运动,积极参加运动,高度重视运动,发扬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坚定不移的精神,并对伟大事业忠心耿耿。”^①列宁百年前说过的这段话为中东国家重建治理能力指明了方向,即民众渴望经济的发展。无论何种政权,当前中东国家的执政根基都是经济治理。以往的经验教训表明,中东国家政府应在经济治理方面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优化经济决策过程对提升中东国家的经济治理能力极为重要。在市场经济体系大体形成的基础上,政府必须加强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并将发展保护性市场作为经济“再起步”阶段的重中之重。在近代以来的经济史上,无论是“西方模式”还是“东亚模式”,都不是在自由市场的状态下实现发展的。当前,中东国家内部确实尚未形成可以驾驭全球化的制度手段,且在商业领域和劳动力方面都不具备竞争优势,^②因此对本国市场加以保护便显得尤为必要。

其次,中东国家市场经济形成与发展的根本要素是生产力的发展,即工业化水平的提升。综合来看,除土耳其、伊朗具备较为健全的工业体系外,其他地区国家的工业化或处于较低水平,或各工业部门比重失衡。黎巴嫩、约旦、埃及、叙利亚、也门等国家大量的劳动力集中于农业部门,侨汇、旅游及外部投资占经济比重较大。截至2014年6月,埃及全国就业人口达2,390万,农业和渔业仍然是吸纳雇工最多的部门,占26.5%。^③整个中东地区的支柱性工业为石油和天然气的原料生产及石化工业,这决定了地区国家尤其是海湾产油国受世界能源市场的波动影响较大。^④因此,发展健全的工业体系能够较大程度减少中东国家的经济波动,促进就业率及国家税收的增长,并逐步孕育出强大的中产阶级力量,从而保持中东国家的政治稳定。

再次,伊斯兰主义者在经济治理方面需要具备更加开明的态度和发展的眼光,对于现代经济因素要合理利用而非从原则上加以限制。^⑤伊斯兰经济思想强调的平

① 列宁:《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1912年6月13日),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5页。

② 冯璐璐:《中东国家经济转型中的风险研究》,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2期,第48页。

③ 杨光:《埃及的人口、失业与工业化》,载《西亚非洲》2015年第6期,第127页。

④ 冯璐璐:《中东国家经济转型中的风险研究》,第46-47页。

⑤ 当代伊斯兰经济学家主要持“调和论”观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穆斯林经济学家范格里,他将1400余年的伊斯兰经济史与当代经济加以调和,提出两点:一是伊斯兰经济原则无可变更,因为它建立在永恒的《古兰经》和“圣训”之上;二是伊斯兰经济系统可以根据社会的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参见马玉秀、翁笑然:《伊斯兰复兴思潮下的伊斯兰经济思想》,载《中国穆斯林》2012年第1期,第12页。

等、团结和互助理念不足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缺乏在激烈市场竞争和较低生产水平的情况下增加原始积累的可行性。此外,部分学者在谋划自身经济发展时,对中东与西方经济之间长久以来的依附关系具有一种排斥反应。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今世界经济体系尽管不甚公平,但已较为成熟。如何融入体系,并有效规避经济风险才是问题的重中之重。

最后,中东国家的经济治理尤其要弱化外部金融资本的干预和过度输入。西方国家及国际组织在提供经济援助时,开出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筹码”,反而加强了中东国家经济的依附性。同时,大量援助被官僚窃为已有,国家经济没有实现资本的集中使用,却造成大量赤字。中东国家如不以最快速度发展和强化自身的工业水平、经济体制、分配和计划制度,无疑会面临经济崩溃的危险。

四、文化之思：面向未来而不是回到过去

福山在分析发展中国家难以“到达丹麦”的原因时提出,制度反映了所处社会的文化价值,谁也不清楚“丹麦”的民主政治秩序,是否“能在迥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扎根”^①。中东地区具有与欧美迥然不同的文化土壤,对中东国家而言,不论多种多样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如何分野,终究离不开世俗与宗教两大力量。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中东国家的宗教与世俗问题,是否如人们印象中的那样——二者之间总是矛盾和对立,并日渐疏离呢?事实上,我们应避免把宗教与世俗的关系简单化。如果从民族主义的外部指向角度来看,二者的关系与其说是对抗性的,不如说是一致的,因为它们都具有强烈的反西方色彩和功能。因此,中东地区民族主义的立场实际上表现为世俗与宗教在时间上是继起的,在空间上是互补的。只是在涉及国家内部治理时,二者的矛盾才会上升为主要矛盾。然而,从内部关系和治理角度来看,伊斯兰教与中东政治的“不离不弃”正是中东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所在,“坚持世俗”还是“回归宗教”始终是中东国家所有人不得不面对的“真问题”。

阿拉伯剧变发生后,政治伊斯兰势力在部分阿拉伯国家崛起一度成为突出的现象,西方学者一度感叹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变成了“伊斯兰之春”。2011年10月,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在制宪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同年11月,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在众议院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2012年6月,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穆

^① [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到法国大革命》,第19-20页。

尔西当选为埃及历史上首位民选总统,成为政治伊斯兰势力走向巅峰的标志;同年7月,利比亚正义与建设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二大党。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在更广的地域范围和更宽的历史时段进行追溯,早在2006年哈马斯便赢得了巴勒斯坦地区立法委员会选举,并组建自治政府;黎巴嫩真主党2011年组阁执政;埃尔多安率领的正义与发展党自2002年以来主政土耳其;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国家的意识形态长期以来处于瓦哈比主义的主导之下;伊拉克和叙利亚则受到以“伊斯兰国”组织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摧残;伊朗自1979年后建立了伊斯兰神权共和国;塔利班在阿富汗统治被推翻后影响犹存。

正当人们关注于政治伊斯兰的力量及其影响迅速上升时,地区国家的局势却又如坐“过山车”般急转直下。2013年后,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领导人巴利辞去总理职务,当年8月,突尼斯制宪议会暂停工作,标志着议会开始与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公开对抗。穆尔西在执政埃及满一周年后遭遇民众大规模抗议浪潮,被军方罢黜。一系列事件使人们意识到,中东地区政治伊斯兰运动正在遭受重大挫折。^① 面对如此情势,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使剧变以来看似风起云涌、民意基础雄厚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在短期内即土崩瓦解? 纵观阿拉伯剧变以来政治伊斯兰势力的起落可以发现,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有关治理与绩效的问题,而政治伊斯兰恰好不擅长于此。

如果说世俗化与伊斯兰的选择是困扰中东伊斯兰国家第一层次的根本性问题,那么对于伊斯兰本身而言,还存在第二层次的问题,即在面对机遇时究竟是尝试“面向未来”,还是执意“回到过去”。事实证明,政治伊斯兰已深陷“回到过去”的泥潭难以自拔。长期以来,政治伊斯兰力量以规范信仰、重建“乌玛”(信仰共同体)为手段,抵制当前的道德沦丧和专制统治。^② 但也正是这种保守性决定了政治伊斯兰力量大多都以“回到过去”的思维方式行事。阿拉伯剧变发生后,伊斯兰主义者以“回到过去”式的口号进行参选,竞选成功后又以“回到过去”的理念作为政策准则。拥有旧日情怀的伊斯兰主义者总以历史上四大正统哈里发“黄金时代”的荣耀引古勉今。大部分伊斯兰主义者认为,只有严格遵循《古兰经》和“圣训”、实行哈里发统治的政体才具有合法性。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竞选中的政治口号便是“伊斯兰是解决办法,是一劳永逸的改革”。^③ 穆尔西上台执政后,穆兄会提议设立“伊斯兰学者委员

^① 林海虹、田文林:《中东转型中的政治伊斯兰运动评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8期,第38页。

^② M. R. Khan, “Political Islam, Democracy and Arab Spring,” *Air Power Journal*, Vol. 6, No. 4, 2011, p. 108, <http://capsindia.org/files/documents/APJ-winter-oct-dec-2011.pdf>, 登录时间:2013年9月10日。

^③ “In Egypt as Elsewhere: Political Islam Is Not the Solution-It Is the Problem,” *Egypt Independent*, October 7, 2011.

会”，负责审查所有法案是否与伊斯兰教法相符。更加激进的萨拉菲派则强调禁酒、戴面纱、男女分开。^① 2012 年底穆尔西宣布在制宪过程中议院和制宪会议可以不受法院裁决的影响，并强行推行伊斯兰性质的宪法。突尼斯同样如此，2012 年 5 月，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领导的政府同意赋予一个主张推行严格伊斯兰教法的公民社会组织“温和觉醒与改革协会”以合法宗教团体的地位。总之，对于阿拉伯国家而言，一味地寻求回到过去而不立足当下、更非面向未来的道路是注定不能长远的，这也是极为惨痛的教训。总结起来，政治伊斯兰的“软肋”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②

第一，政治伊斯兰拒绝接受世俗主义，认为世俗主义基于西方自由主义，其目的是损害伊斯兰教的影响，为西方殖民者服务。在深受西方干预的中东国家，这种独特的价值观使政治伊斯兰比世俗力量更具道统优势。当阿拉伯国家世俗化努力受挫并进入大变革时期时，民众很可能将“转向伊斯兰”作为突围路径。然而，阿拉伯国家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生存环境与伊斯兰教初创时期存在天壤之别，寻求通过回归传统来实现民族复兴的愿望，很难将传统价值与复杂现实进行“对接”。

第二，在阿拉伯国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根植于传统生产方式的伊斯兰教面临与时俱进的难题。当前的中东政治伊斯兰势力表面上辐射到社会各个阶层，呈现出“全民党”的特征，但实际上只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甚至买办阶级的利益。据悉，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层多属于富裕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沙特和美国的资金援助，外围是中产阶级中的“蒙昧主义者”，基础是宗教协会通过慈善服务招募的平民。^③ 这种阶级属性决定了政治伊斯兰势力即使上台执政，也不可能是先进阶级取代落后阶级，更不可能实现先进生产方式取代落后生产方式的变革。这种矛盾性在埃及、阿尔及利亚、伊朗、苏丹等国家中均有体现。^④

第三，政治伊斯兰势力沉重的历史包袱制约了社会发展道路的多元性。从伊斯兰教发展的历史看，“创制之门”自 10 世纪之后就已关闭，目前伊斯兰教仍处在一个相对滞后的发展阶段，但其具有强烈的涉世性，大多数世俗政治体制国家无法脱离伊斯兰教的影响，伊斯兰教不只是宗教，还是政治、伦理观念和社会组织。^⑤ 最重要

① Fayoum, "Political Islam: Everywhere on the Rise," *The Economist*, Vol. 401, No. 8763, 2011, p. 49.

② 林海虹、田文林：《中东转型中的政治伊斯兰运动评析》，第 35-41 页。

③ Samir Amin, "Speaking About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Axis of Logic*, http://axisoflogic.com/artman/publish/Article_62279.shtml, 登录时间：2016 年 6 月 8 日。

④ Deepa Kumar, "Political Islam: A Marxist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July-August 2011.

⑤ 王京烈：《伊斯兰宗教改革与中东社会变革世界史视角下的中东社会发展剖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 年第 1 期，第 50 页。

的是,政治伊斯兰运动的主要出发点与落脚点仍停留在对政治与社会层面的改造,忽视了经济建设对于执政者的重要性。从另一个角度看,“回归过去”的思路限制了政治伊斯兰势力对现代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当威权统治被推翻后,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成为民众的首要诉求,而这恰恰是政治伊斯兰势力无法解决的问题。2011年初,开罗解放广场的示威口号体现了埃及民众对自由、尊严、公平、正义的普遍诉求,而不是为了“面包”,但经历过几年的动荡和经济停滞之后,埃及人提出“给我面包吧,其他都不重要”^①,这也成为埃及、突尼斯等中东国家政治伊斯兰势力最终下台的重要原因。

伊斯兰主义者或者说政治伊斯兰势力的出路绝不在于“回归过去”,而是必须勇敢、包容和积极地面向未来。当前中东国家的政治在世俗与宗教博弈的现实表明,伊斯兰主义者为中东政治发展所做出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当然,伊斯兰主义者需要“面向未来”绝不意味着要“忘记过去”。作为中东伊斯兰国家穆斯林民众精神核心的伊斯兰教是无法被“忘却”的,这是一个变迁中的心理适应与文化抗拒的问题。近代以来,中东伊斯兰国家在与西方交往过程中的弱势心理,导致这些国家的穆斯林在应对现代化和全球化挑战的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心理不适或异常的文化抗拒现象。这种现象进一步导致掺杂着激进与保守、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等多重矛盾对抗性基因的各种伊斯兰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未取得成功。因此,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文化需要得到坚守,关键在于如何在坚守伊斯兰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实现变革与发展;伊斯兰教应更多地作为穆斯林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体现,而放弃对政治的干预。中东伊斯兰国家既不能回到1,400多年前伊斯兰教的初创时期,更不能因全盘模仿西方而陷入“邯郸学步”的另一极端。

五、民族之信：找寻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中东国家最终能否走上政治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它们最终会走向何处?为了回答这个世纪性的“中东之问”,除必须处理好上述四个方面的难题与挑战外,还需要从政治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顶层设计来解决两个关键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民族和解与政治包容的问题。长期以来,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人们对和解的关注远不如对冲突的关注。但事实上,实现各方和解才是政治良性发展的基础,“和解”意味着宽恕、宽容、平息纷争、重归于好。作为世界热点的中东国

^① 周轶君:《埃及革命死了吗?》,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6764>,登录时间:2016年2月26日。

家面临不同宗教意识形态、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冲突,同一国家内部各种政治势力、宗教派别、族群的冲突,乃至世俗与宗教的冲突等。在政治变迁的过程中,原来被掩盖和被压抑的问题重新暴露出来,使冲突成为常态,和解和包容反而成为政治发展的“稀缺”因素。

牛津大学保罗·科利尔教授对埃及过渡时期的几种“信任”状况进行了分析,主要观点如下^①:

第一,从包容性政府的角度来看,穆巴拉克政权倒台之后,仓促举行的选举成为民主设计不当的关键。但在当时权力真空的背景下,不举行选举似乎又不足以维持未来新政权的合法性。但问题在于,这在脆弱的过渡政权中常常是伴随着风险的。根据过渡性选举的心理学,经由此前未经检验的投票系统使落败的一方不可避免地产生质疑而不接受结果。选举的结果是一大群公民被排除在权力之外,并认为他们的失败是非法的,对于那些认为合法性很重要的关键群体,即那些不支持政府的民众,不会授予政府合法性。相比之下,同样的心理偏差可能会让赢家相信,他们对权力的垄断是合法的,因此没有义务以一种包容的方式来执政。

“赢家滥用胜利,排除异己。输家不承认赢家的合法性,所以在适当的时机走上街头,通过挑起混乱推翻政府,这就给了军方重返权力的借口。因此,埃及过渡政府失败的教训是,在脆弱的过渡情况下,需要一个大联合政府而非一个赢者通吃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大联合政府)会是混乱的,并将屡受民粹主义爆发的折磨,但它因具备足够的包容性而强大”^②。与埃及形成对比的是,突尼斯在本·阿里政权倒台之后,选举获胜的三个政党——伊斯兰复兴运动党、保卫共和大会党和争取工作与自由民主论坛(FDTL)形成了右、中、左翼三大阵营,并组建民族团结政府,形成“突尼斯模式”,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国内矛盾,有利于政权的平稳过渡。

第二,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看,埃及社会的结构性问题表现为,埃及社会被既有的身份认同分歧所割裂。政府到底是伊斯兰社会的先锋,还是世俗国家的前卫?如果是前者,那么伊斯兰力量一旦上台执政,它就可以合法地采用各种有效手段击败对手。这种叙事显然与民主格格不入。至于后者,世俗愿景虽与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多种叙事相兼容,但这些叙事实际上却并不都需要民主。因为可行的民主方案可能源自人们对彼此看法深入而缓慢的变化,政治分歧的各项参数只有以社会成员一定程度的相互尊重为基础才变得可控,而埃及公民之间却缺乏这种意义上的相互尊重。

^① [英]保罗·科利尔:《埃及:民主有局限吗》,肖丹译,载《中国改革》2013年第10期,第90-94页。

^② 同上。

第三,实现和解和重建公民间相互尊重的方式成为埃及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科利尔认为宗教信仰实际上不能作为相互尊重的基础,政治和解也不能长期有效。中东国家的现实表明,政治和解只是一个开始,而更多的事实证明,政治和解不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因为政治的问题总是会因为政治主体的喜好发生变化,正如埃及军队、世俗派和穆斯林兄弟会三者关系的角力所呈现的政治图景那样。因此,或许寻求最广泛的社会共识才是和解的基础,只要民族内部无法建立起长期有效的深层次社会心理和解,政治包容就不可能实现,动荡也会持续。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国家或者民族整体的交往自觉,即关于发展的独立自主与坚持道路自信的问题。从19世纪中期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主义的初步形成,到20世纪中期对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艰辛探索,再到21世纪初期全球化时代陷入经济迟滞、政治动荡与社会混乱,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地区像中东尤其是阿拉伯世界这样长期处于迷茫、苦闷和彷徨状态。正是在贫穷与耻辱交织、失望和怨恨共存的历史进程中,中东的有识之士和普通大众发出了他们寻求民族独立、振兴国家、复兴文化和宗教、追求民主的强音,汇成了一波又一波起伏激荡的社会革命和运动。世界近现代史表明,无论现代化原发国家还是外源型国家,只有坚持独立自主、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以本国国情为基准制定长远可行的发展规划最终才能取得成功。反观中东地区,一些地区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连续遭遇挫折,而且长期处于依附地位,逐渐丧失了自主发展的能动性。国家发展道路至关重要,“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问题解决不了,国家的发展将长期处于混乱状态。伊斯兰文明曾经的辉煌并不能掩饰近代以来中东伊斯兰国家的长期衰落,它们始终没有找到一条独立自主且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夭折后,中东伊斯兰国家便处于长期被域外大国操纵的状态,且受到世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冲击。事实证明,“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道路同样不能促使中东从充满混乱与动荡的文明迷思中清醒。在埃及,纳赛尔提出的阿拉伯社会主义道路没能走通,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所践行的新自由主义道路也没有走通,而穆兄会主张的伊斯兰主义道路更是昙花一现。埃及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努力寻找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特点的发展道路,并且坚定道路自信,是最为关键的历史任务。

(责任编辑:李 意)